

贛鄱流域先秦文化探討

許智範

贛江—鄱陽湖流域係指今中國江西省境，地處華南地區北部。這一帶在古代是北方通往嶺南地區的必經過道之一，是中原文化進入江南的門戶，又是長江上游與下游、東南文化與西北文化交匯的聯絡之點，正由於這一特殊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的古文化研究在中國考古學上居有重要的地位。

近年來已有諸多文章全面介紹了贛鄱流域的考古發現^①，更有海內外學者對有關問題進行探討，已較清晰地揭示出這一地區先秦文化的發展脈絡；江西省博物館研究員彭適凡先生的專著《江西先秦考古》，論題廣泛，見解獨到，集中展示了這一課題的研究成果^②。

贛鄱流域的人類活動歷史目前已可追溯到距今四、五萬年以前。早在1962年，地處贛東北的樂平湧山岩就發現過打製石片石器。1989年在贛北的安義發現三處舊石器地點，採集到37件石器，係選用石英岩或砂岩質的自然卵石打製而成，深埋在二級階地的紅色黏土(網紋土)中，其地質年代為晚更新世，考古學年代為舊石器時代晚期。同年又在贛中的新喻發現兩處地質與考古學年代同安義相近的舊石器地點，採集到11件打製石器。

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是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的代表，其下層的年代距今九千年至一萬年。該遺址打製石器與磨製石器共存；大量使用骨器、角器、牙器和蚌器；陶器胎質粗糙，全為手製，火候很低，陶色不穩定，器形只見飾粗繩紋的直口圓底罐。根據出土物分析，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尚很低下，原始居民主要依靠漁獵和採集野果為生；原始農業或園藝業剛出現萌芽；遺址中出土的

野生動物遺骨則表明了仙人洞人居住環境的險惡和他們創業的艱辛^③。有研究者認為該洞穴遺址的堆積是「華南全新世洞穴堆積標準剖面的代表」^④。

1993年秋季由中美聯合考古隊發掘的位於仙人洞遺址對面的吊桶環遺址，文化內涵較為豐富，從出土的夾粗砂繩紋陶片和蚌器等分析，明顯屬於仙人洞文化系統，證明贛鄱流域仙人洞文化不是孤立存在。

距今四千五百年至六千年的文化遺存，當以新喻拾年山遺址和靖安鄭家坳墓葬為代表。1986至1989年間，拾年山遺址經過連續三次發掘，在揭露的上千平方米範圍內，清理出墓葬八十座，房基九座，陶片堆和石器堆數十處，出土各類遺物三千餘件。該遺址分為三期，既有華南和東南地區同類文化的某些因素，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各期的主要陶器明顯有別，從紅衣紅陶到黑衣紅陶到黑灰陶；石器以長身弓背鏃、鏹和有段石鏃為主，很適宜耕掘南方的黏性紅壤土。在氏族墓地同時發現有壙穴墓和無壙穴墓，有壙穴墓的墓壙較小，壁底經過燒烤，下面填有數十厘米厚的夾炭灰燼土，可能是拾骨火葬習俗的反映；房基平面呈圓形，為木骨泥牆，牆壁和柱洞壁也都經過燒烤，房基面鋪墊有厚實的燒土層。^⑤鄭家坳墓地在1983年清理十座長方形土坑豎穴墓。隨葬品多置放在墓底兩端，少量置放在死者腰側。陶器多為黑灰磨光陶，其組合為鼎、豆、壺、罐，盛行三足器、圈足器，石器以大型石刀、鏃、鏃最具特色。鄭家坳墓葬出土的典型器物如帶把鼎、有稜喇叭座及大石刀等與薛家崗類型三期文化雷同。^⑥

Xu Zhifan :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Jiangxi Provincial Museum, China

許智範：江西省博物館副研究員

贛鄱流域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共有三十多處，大致可分為山背文化和築衛城—樊城堆文化兩種類型。

山背文化是一種以有段石鏃和紅砂陶為主要特徵的原始文化遺存，主要分佈在鄱陽湖以西和贛江下游地區，時代距今約五千年。生產工具以大型厚重的長條形有段石鏃、扁平長方形石斧和半月形帶孔石刀為代表；陶器多夾砂紅陶器。該類型的文化面貌雖表現出與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文化及東方沿海的大汶口文化有某些相似的因素，但器物群的特徵是明顯的，表明它是土生土長的地方文化。⁽⁷⁾

築衛城—樊城堆文化是主要分佈在贛江中下游地區的另一種原始文化遺存，時代距今約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生產工具以弓背長身石鏃、長方形或梯形石刀、石鐮較有特色，半月形帶孔石刀則少見。陶器以夾砂質和泥質橙黃色陶居多，次為灰陶和黑皮磨光陶，另有少量白陶，器形以式樣繁多的三足器最富特色，遺址裡出土有二十餘種鼎足，多為丁字形足，且在鼎足側面刻劃、壓印或戳刺有各種紋飾。⁽⁸⁾

在多處遺址中發現的稻穀殼和留有稻桿痕跡的草拌泥，證實四、五千年前在贛鄱流域種植的重要農作物是水稻，當時的居民們主要以從事原始農耕為生。「飯稻羹魚」在那時最普遍的經濟生活，而共同勞動、共同享用的氏族和部落則是當時基本的社會組織。

距今三千多年前，贛鄱流域的先民們也創造了舉世矚目的青銅文化。吳城文化是該地區商代文化的一種主要類型，主要分佈在贛江中下游和鄱陽湖西北岸一帶以樟樹吳城遺址和新淦大洋洲墓葬為其典型代表。

吳城遺址自一九七三年發現以來已先後進行過八次大規模發掘，揭露面積近五千平方米，發現一批房基、路面灰坑(窖穴)、水井、窖床、祭祀場所和墓葬，發現刻劃在陶器及石範上的文字或符號170多個，出土各類器物

1400餘件。該遺址可分為商代中期、商代晚期和商末到西周初三期，延續時間長達數百年。吳城遺址出土的器物與中原地區商周時期的遺物有很多相似之處，在青銅器上也可看到中原文化的影響，但吳城文化具有不少明顯的地方特點，如生產工具中的凹陷石斧，帶紋飾的馬鞍形陶刀，以及吳城特有的陶器群，大量的幾何形印紋陶器和原始瓷器等，都是與中原文化有所差別的。⁽⁹⁾

吳城遺址的發掘已反映了贛鄱流域商代文化的大致面貌，1989年秋季發現的新淦大洋洲墓葬則以極為豐富的文物資料揭示了該地區商代文明的繁榮昌盛及其發達程度。該墓葬出土品種繁多、鑄造精美的青銅器484件，玉器1072件，陶器356件；同吳城遺址的出土物一樣，少量青銅禮器在造型與紋飾上帶有中原二里崗期即商代中期的痕跡，更多的禮器則表現出與殷商文化相同或相近的特徵，但同時在局部造型與造型作風上，尤其是在生產工具及兵器上，也滲透著濃厚的地方特色；有些器物在國內已發現的商墓中甚至前所未見。新淦商代墓葬的器物組合中沒有中原常見的爵、觚、斝等酒器，還有紋樣和裝飾附件上盛行虎的雕塑性動物形象，帶狀燕尾紋的裝飾較為普遍，採用陶範與石範而用的鑄造工藝等，也都很有特色。⁽¹⁰⁾

大洋洲墓葬的發現表明，商代「贛江流域確曾有著一支與中原商周文化並行發展著的土著青銅文化，有著與中原商殷王朝並存發展的另一個地域政權。...墓主人可能就是這一政權的最高統治者或其家族」⁽¹¹⁾。關於墓主人的族屬，當與吳城文化的族屬一致，目前有兩種觀點。一為「揚越說」，認為當時揚越的地域不僅包括江漢地區，還應包括鄂東南以及湖南與江西的大片地區，其東界大體以鄱陽湖為界，今鄱陽湖以西的贛北、贛西北及贛江西岸都應是揚越的聚居地。揚越族商代文化有幾大土著特色：別具特點的生產工具；造型特異的器物群；豐富多樣的幾何形印紋陶器；運用廣泛的釉陶和原始瓷器；古老的早期青銅鑄造工藝；有一批難以釋讀而已失傳的文字。⁽¹²⁾另一為「干越說」，認為卜

辭及先秦典籍中所提及的「干」，其確切地點應當在江西，其代表文化是吳城文化一、二期；干越作為一個獨立的奴隸制國家，與中原商王朝並無隸屬關係，而吳城及鄰近的新淦大洋洲地區直到西周時期仍然是干越的政治中心。干越族青銅文化有兩大特色：崇尚猛虎形象，虎是其主要圖騰；注重鑄造兵器、工具等實用青銅器。⁽¹³⁾

萬年類型文化是贛鄱流域另一種商代文化的主要類型。這一類型文化主要分佈在贛東地區，它一方面與吳城又有差別。萬年類型出土較多的帶把鉢、支座等器型在吳城少見，而吳城大量出土的陶鬲、袋足甗等器形在萬年又很少見；該類型青銅器發現較少，在文化面貌上土著特色更鮮明。⁽¹⁴⁾

事實表明，儘管贛鄱流域商代文化受到過中原地區高度發展的青銅文化的強烈影響和浸潤，但主要還是先民們在本地創造的富有自身特色的青銅文化。吳城遺址出土的大批冶鑄青銅器的石範、銅渣、木炭，以及近年發現的瑞昌銅嶺商周銅礦採煉遺址，更為這一結論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例證。

瑞昌銅嶺遺址的面積約四平方公里，在前後四期考古發掘中，已揭露一千八百平方米採礦區和一千二百平方米冶煉區，清理出礦井百餘口、巷道十八條和冶煉爐兩座；發現有露天採礦和選礦的遺蹟，還出土有品類繁多的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器，它們分別用於採掘、搬運、排水、篩選和飲食、照明。該遺址採掘時間從商代中期延續至戰國早期，其開採技術具有地方特色，有一套自身發展的採礦工藝。⁽¹⁵⁾

贛鄱流域西周文化遺存分佈密集，已經發現數百處遺址。這一時期隨著中原地區商周文化影響的加強，贛鄱流域的青銅文化除了保留一些地方特點外，中原文化的因素已經明顯增多。新淦「列鼎」的發現證明周王朝的統治勢力已經抵達贛境。⁽¹⁶⁾再由鑄有銘文「雁監」的青銅甗及鑄有「艾監」的銅飾件等出土物推斷，贛鄱流域在西周時期至少已

有兩個以上受命於中央王朝的地方政權。⁽¹⁷⁾

春秋戰國時期，贛鄱流域也開始逐步進入以使用鐵器為標誌的封建制時代。九江等地遺址或墓葬出土的鐵器及殘件，證實春秋晚期到戰國早期，至少在贛江下游一些地區已經開始使用鐵器，只是這時鐵器數量還較少，器類只有小型農具和手工業工具。到戰國中、晚期，贛境內發現鐵器的地域更寬廣，鐵器的數量增多，表明其使用已日趨普遍。當時冶煉鑄鐵技術也已比較進步，澆鑄法製成的鼎足與鐵質斧範的發現就是明證。

這一時期，贛鄱流域曾分屬吳、越、楚管轄，故歷史上有「吳頭楚尾」之說。從有關考古資料和史料考證，楚的勢力伸入贛境是在春秋中期以後，大體鄱陽湖以西地區屬楚，以東即贛東北部份屬吳，贛東贛南屬越。吳王闔閭十年(公元前505年)曾派太子夫差「破師取番」，大敗楚軍，從而一度進展贛西北之楚地，然而好景不長，在公元前473年，越滅吳，越趁此機會又佔領贛西北地區；此時楚復又強盛起來，逐漸收復了被吳越奪取的土地，其中也包括贛西北和贛北地區，到公元前306年前後，楚滅越，南方全境屬楚。⁽¹⁸⁾

根據考古資料，到春秋時期贛鄱流域的古文化面貌已呈現出新的變化趨勢，即由於周王室的衰微和諸侯國的興盛，中原文化的影響大大減弱，而地處東西兩面的吳越文化和楚文化則給這一地區的文化以更強烈的影響。

1978至1979年間在貴溪仙岩清理的十八座春秋戰國時期的崖墓中，發現棺木39副，人骨架16具，出土陶器、原始青瓷器、紡織器材、樂器、木器、竹篾器及絲麻織品等隨葬器物200餘件。⁽¹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調查，在贛鄱流域有十餘個縣市發現古代的崖葬墓，其主要分佈區為贛東北的信江流域，尤以贛贛交界處的武夷山西北麓最為密集。崖墓出土的品類繁多的文物資料，展示了頗具特色的越族文化面貌：信奉蛇，尚斷髮，喜食腥，飼

家畜；日常居住干欄建築，死後實行崖洞群葬；進步的陶瓷燒造業、竹木加工業與紡織業；金屬冶鑄水平頗高，隨葬忌諱金屬器具；使用本民族的文字；豐富多彩的業餘生活。⁽²⁰⁾

樟樹、修水等地曾先後發現過一批吳國銅器和具有吳器作風的青銅器。在貴溪崖墓文物中，有一大批具有吳越文化特徵的陶瓷器，其中包括仿銅泥陶器、幾何形印紋硬陶器和原始青瓷器。它們有些同越國都城所在浙江紹興地區的墓葬出土物十分類似，有些則同時具備有吳越兩方面的文化因素。

新建昌邑發掘的土坑墓和高安郭家山清理的木槨墓，其時代都屬戰國中期，從墓葬形制、器物造型風格和陶器群以鼎、敦、壺的組合為主的隨葬器物看，可斷定是典型的楚墓。此外，贛境其它各處還零星發現過不少楚文物，這些楚文物多數出自既有「楚式」遺物又有「越式」遺物的墓葬中，這無疑是受到楚文化影響的結果。楚文化的影響既包括楚勢力未進入前的交往，也包括楚勢力抵達後的輸入；即使到楚國佔領贛境之後，其文化影響也難以立即全部改變當地千百年來形成的越文化傳統，特別是在部份邊遠地區，直到戰國中、晚期，其越文化的因素仍然相當濃厚。⁽²¹⁾

縱觀贛江一鄱陽湖流域先秦文化發展的軌跡，明顯可以看到，從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的「史前時期」開始，這一文化就有其自身發生、發展的悠久歷史；它既與黃河流域及其周圍地區有密切的交往，又有濃厚的地方特色，這就是從先越文化發展到古越族文化，它是貫穿贛鄱流域先秦文化的發展主線。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它吸收其它文化的進步因素，交匯融合，同時不斷發揮自身的優勢，逐步形成了富有鮮明地方特點的區域性文化。按照考古學文化的定名慣例，我們可以將這一文化定名為「贛鄱文化」。贛鄱文化與其周圍地區的荆楚文化、吳越文化等一樣，曾經在中華大地上競放異彩，並且千秋光耀華夏文明史冊。

註釋

- (1)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考古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頁240。

江西省博物館等：〈十年來江西的文物考古發現與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頁149。

- (2) 彭適凡：《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4月。

- (3)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第一次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63年第1期，頁1。

江西省博物館：〈江西萬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遺址第二次發掘報告〉，《文物》，1976年第12期，頁23。

- (4) 曾驥：〈試論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 (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新喻市拾年山遺址〉，《考古學報》，1994年第3期，頁285。

- (6) 江西省文物工作隊：〈江西靖安鄭家坳新石器時代墓葬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 (7)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西修水山背地區考古調查與試掘〉，《考古》，1962年第7期，頁353。

彭適凡：〈試論山背文化〉，《考古》，1982年第1期，頁40。

- (8) 江西省博物館等：〈清江築衛城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76年第6期。

- (9) 江西省博物館等：〈江西清江吳城商代遺址發掘簡報〉，《江西歷史文物》，1975年第7期，頁51。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樟樹吳城遺址第七次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第7期，頁1。

李伯謙：〈試論吳城文化〉，《文物集刊》(3)，文物出版社，1981年3月，頁133。

(10)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大洋洲商墓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10期，頁1。

(11) 彭適凡等：〈江西新淦商代大墓文化性質認識〉，《文物》，1993年第7期，頁10。

(12) 彭適凡：〈吳城青銅文化與古揚越〉，《華夏文明》第2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

(13) 徐心希：〈試論新淦大洋洲青銅器群的族屬及其相關問題〉，《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頁37。

(14)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一九六一年江西萬年遺址的調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頁167。

劉林等：〈江西青銅文化〉，《江西歷史文物》，1983年第3期，頁37。

(15)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銅嶺遺址發掘隊：〈江西銅嶺商周礦冶遺址第一期發掘簡報〉，《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頁1。

(16) 彭適凡等：〈江西省新淦縣的西周墓葬〉，《文物》，1983年第6期，頁93。

(17) 李學勤：〈應監甌新說〉，《江西歷史文物》，1987年第1期，頁23。

(18) 彭適凡：〈「吳頭楚尾」辨析〉，《爭鳴》，1988年第2期。

(19) 江西省歷史博物館等：〈江西貴溪崖墓發掘簡報〉，《文物》，1980年第11期，頁1。

(20) 劉詩中：〈貴溪崖墓所反映的武夷山地區古越族的族俗及文化特徵〉，《文物》，1980年第11期，頁26。

(21) 李科友：〈東周時期江西地區的楚文化及其相關問題〉，《中國考古學會第二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頁51。

A Study of the Pre-Qin Culture in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Xu Zhifan

[Abstract]

The drainage basin of Ganjiang and Poyang Lake occupies an extensive area covering practically the whole of the Jiangxi province in northern Hua'nan. Because of its unique geographical setting, it was the converging point of various ancient cultures. Therefore, the study of its ancient cultur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hinese archaeology. Excavations and researches carried out in the area over the past four decades have successfully assembled numerous valuable data for scholars to reconstruct a clear picture of its Pre-Qin culture and to trace the route of its development.

Human activities in this are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s early as forty to fifty thousand years ago. The early stage of its Neolithic culture is represented by the site at Xianrendong; the middle stage by Shinanshan and Zhengjia'ao; the late stage by Shanbei, Zhuweicheng and Fanchengdui, characterised by a farming-fishing economy, clan and tribal society. The most typical of Shang cultures are the Wucheng and Wannian assemblages, the former being represented by sites at Wucheng, Dayangzhou and the Shang-Zhou bronze foundry site at Tongling. The finds have evidenced the advanced technological level of the people and the existence of a regional regime enforced by

slave-owners in an intensity comparable to that of the Central Plain.

With the southern expansion of the court's ruling force in the Western Zhou period, more than two regional regimes empowered by the Zhou court had come to exist in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when the Iron Age was at its dawning stage, this area was within the jurisdictions of the states of Wu, Yue and Chu, but later fell entirely into the hand of Chu after the other two had been annexed. Remnants of this period have revealed that cultural influence from the Central Plain had weakened while local influences prevailed, as exemplified by the burial assemblage at Xianyanya where Yue culture predominated.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Pre-Qin culture in the Ganjiang-Poyang basin was founded mainly upon Yue culture. As it evolved along, numerous distinguished elements from neighbouring cultures were absorbed into it to form eventually a unique culture of its own. This regional culture might then be named "Ganjiang-Poyang culture" to stand in line with the remarkable Chu culture and Wu-Yue culture.